绪　　论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已经认识到可以通过艺术审美对人的精神实施积极的引导。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人们又逐渐掌握了审美教育的一些特殊机制。例如，与音乐的相对发达相适应，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注意到艺术的情感性，肯定艺术具有“动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能量。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体会到了艺术所蕴含的感人力量。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意识到道德说教在教化作用方面代替不了能够交流情感的音乐。《礼记·乐记》还分析了各种类型的音乐对人的情感的适用性，说“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而与悲剧的兴盛相适应，西方古代思想家则较多地看到艺术的形象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已经初步认识到艺术能够通过形象、情感等因素对人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孔子将审美教育称之为诗教，诗教是一种不同于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的教育，它对人产生“兴、观、群、怨”的心理效果，它“温柔敦厚”；“可以善民心，其感人也速，其易风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俗 ’[①]。在西方，亚理斯多德也通过对希腊文化艺术，特别是通过对希腊悲剧的欣赏而意识到艺术具有“ 净化 ” 心灵的作用。稍后罗马人贺拉斯便明确地提出了“ 寓教于乐 ” 的思想。在利用文学艺术进行审美教育方面，中国古代统治者表现出相当的热情。《毛诗序》指出,那时的诸侯王,已经懂得利用音乐达到‘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的目的。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今天,在美学理论中讨论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似乎显得很不合时宜了。对长期牢笼文艺理论界的僵化的“ 载道 ” 文艺观的反弹，往往殃及到正确的客观的艺术目的论和艺术功利论的命运，而只有承认艺术因为感人而对人的行为可以有所规范的特点，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利用这些特点，发挥艺术的美育作用的问题。而时下，无目的、无功利的艺术论风头正劲，对之解释文艺的美育作用，仿佛是强与道不同者说道。但本书的作者不能同意将审美意识与功利意识绝然对立的观点。文艺的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能对艺术对人的情感的深深感染，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事实，熟视无睹吗？我们注意到有人以强调审美的快感来否定艺术的社会价值。但是，我们想问，求乐的需要难道不是人类对艺术所持的一种功利的立场？事实上，我们只要不否认艺术审美是人类一项有目的的活动，我们便不能否认艺术审美与生俱来的功利性。因此，在我们看来，问题只是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文艺的功利性。

探讨艺术的美育功能，必须以承认艺术客观存在的精神影响力为前提。那么，艺术又是怎样以它审美的存在，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并发生作用的呢？

我们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美育总是通过对艺术的欣赏实现的。艺术欣赏既是一种情感的体验，又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有意

① 《礼记·乐记》。

识的思索。在艺术欣赏中，这种思索也是情不自禁地发生的，是艺术的形象、情节、情感激动了读者，促使其围绕作品所构建的艺术世界开展自己的思维活动。欣赏激发思索，而与欣赏相伴随的思索又是提高审美品位，获得更多收获的前提。

《台城》是唐代诗人韦庄的一首小诗:“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情凄迷,在对古都风物的状写中隐隐地透出一种苍凉。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登临台城,眺望湖山,还会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但是,当你对《台城》一诗再加深味，你就会把捉到诗人寄托于小诗中的历史意识，发现诗人用霏霏江雨、萋萋江草、啼鸟、柳色,精心妆点了一个关于“ 六朝 ” 的梦。如果说李白、刘禹锡、杜牧的金陵诗直白地表达了他们对金陵旧事的追怀的话,那么,韦庄的《台城》却于金陵寥落的春意的勾勒中深蕴了对湮灭的王朝最苍凉的凭吊。而且，韦庄的《台城》还有别一种深刻，即诗人着意将简单的感喟升华为对王朝兴废的伏线的开掘:“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二句,景物的描写在我们看来只是表象，而真实的意图在于暗示金陵苍生对此间王朝不断变换的惊人的麻木。金陵人不仅全无一般京都子民的自豪感，也无意为一个个衰亡的王朝尽忠！于是，读者必得要进一步思索，南京的先民该不该为这种麻木受到责备？

我们知道，六朝的那些帝王，大多是些裂土而王且极短命的割据者。往往旗号刚一打出，斧钺也便跟着来了。只要战端一开,割据的帝王便忙不迭地差遣金陵子民去对付江淮烽火万一城破，以受之父母的血肉之身为王前驱得填沟壑者亦尽皆金陵子民。而那些惊魂甫定的六朝帝王本人，全然不知施惠斯民，顾自享福，一个个钻进了秦淮河畔的温柔乡里，缠绵起来，去演绎霓裳羽衣的风流故事。人们一定会发生这样的困惑：自称秉笔直书的史家，为何只记录帝王的轶闻逸事，而对金陵无辜苍生的呼号，充耳不闻！这情景岂不让金陵的善良百姓寒心。失望之余，他们对石头城上不

断变换的旗帜,也就日益显出见怪不怪的冷漠,一句话,帝王寡恩,怎怨百姓薄情！孙权是六朝帝王中的强者，几度苦心经营，亦曾辉煌一时，但不肖的子孙只知享乐，罔顾苍生。因此，当孙皓为加强上游武备，欲迁都武昌，胁迫金陵士民同往时，此间人士照样慨然高呼‘ 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 ”,毫不稀罕京都子民那个名分,对荒淫的统治者吐出了一口郁积得很久的恶气。显然，金陵民风的无情，正是对六朝帝业的否定。六朝帝王与金陵子民如此低值的亲附力，充分说明金陵已无险可守，金陵诸朝的短命是历史安排的合乎逻辑的结局。《台城》想要告诉人们、相信也一定会被读者认同的道理就是：责备台城柳色无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艺术通过欣赏及欣赏中不免会有的思索获得了审美的深刻。这就是审美的魅力。不仅如此，艺术还会促使人们去按照人类理性按照美的规律行动，对世界作出更合于理性的重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回顾他在科学上的成就的获取过程时说，他曾在欧洲艺术家的绘画中，获得了发现的灵感。特别是因为艺术具有煽情性，因此，往往能对人的情绪有较大的调动，促发出与艺术价值取向一致的行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诗作所感叹的帝王对鲜活的生灵毫无人道的摧残，一定会激起人们的愤慨，产生拆毁这扼杀青春的宫墙的强烈愿望。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也可以了然,美育的极境是艺术对生活的精深的挖掘，展示出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发现，以此来打动启发它的读者。审美不能强迫，因此，美育功能的实现取决于艺术所拥有的魅力。也就是说，讲美感的升华作用，就必须讨论艺术本身的特点。

我们知道,审美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关系的统一，是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关系的统一。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之为审美的对象关系，将后者称之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审美的对象化关系中，我们发现，艺术总是包含了对客观事象的模仿

因素和主观情志的表现因素，从艺术的具体构成看，艺术总是一定的内容与一定的形式的耦合。认识到这些基本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较为从容地来讨论艺术美感效应的本质。我们知道，艺术的模仿因素表征了艺术与对象世界的联系，是艺术中的客观因素，它要求达到反映的真实。林兴宅先生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归纳为五个层次的意义 现实感、真切感、逻辑感、生命感、历史感。他说：“文艺的真实性严格说来只是艺术形象的似真性、幻真性。这种似真性或幻真性，促使读者对艺术形象作出确认。读者在文艺欣赏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从作品中所感知的表象同贮存在经验记忆中的某一‘样本’进行比较。如果它们相同或近似，读者就对这一形象作出确认，进而经过想象的作用或持久注意的过程，心灵就会进入形象所形成的规定情境，而产生一种逼真的感觉。”① 表现因素则是艺术中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同艺术的个体性相联系，因此，总是会显示出审美形态上的特殊性从审美的实际看，愈是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的作品，愈会受到读者的关注，因为它提供了别样的风情与景致，让置身在习见常闻的事象中感觉近于麻木的人产生新颖别致的感觉，它出乎人们的意料，却又完全合乎情理，人们正是从它拨动心弦的震撼中，对那些合乎情理但平时缺乏注意的现象重新进行一番审美的深思，将其对该事物的体验提升到新的层面。例如，人事兴废，常常成为古代诗人咏叹的主题，但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却出人意表地从人与鸟缺少关联、而常人也难以将其联系起来思考的意象中获得了灵感，“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从鸟的自由的来去,引出人的动情的歌哭，这意象别出心裁，却极好地表达了诗人极想有为却又充满了岁月蹉跎的无奈及物是人非的沧桑意识。从内容因素看，艺术的内容是意蕴、形象的审美表现，从价值取向看，要求它能轨合于

①林兴宅:《论文学艺术的魅力》,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类普遍理性，即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从它的基本特征看，则应特别强调意义的蕴藉与情感的深沉。建国以后，文艺创作中出现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偏向，艺术家仅仅注意内容的革命性，却忽略了作为艺术内容所必需的含蓄与深沉。公式化、概念化的艺术作品尽管将革命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但作为艺术却是苍白无力的，它不能感人，因为它与欣赏者难以达到审美的、亦即心理的情感的耦合。艺术内容的情感性也是艺术之具魅力的重要原因。“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抒情主人公在诗句中所包藏的激越的情感，一下子抓住了读者，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跟着诗人在艺术时空中遨游，一同慷慨，一同惆怅，体验各种与读者的生活体验颇多睽隔却又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一致的人生感悟，并产生深深的同感。在蕴藏情感、调动情感方面，音乐在艺术中更有其典型的意义。像贝多芬的《命运》、肖邦的《革命》无疑具有强烈的煽情效果。艺术的形式因素，既要为内容的表现服务，同时，它本身也具有美学素质，即应尽可能地达到完美。桑塔耶那说：“ 假如雅典娜的神殿巴特农不是大理石筑成，王冠不是黄金制造，星星没有火光，它们将是平淡无力的东西。在这里，物质美对于感官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刺激我们同时它的形式也是崇高的，它提高而且加强了我们的感情。'① 也就是说，艺术因为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而获得了强烈的美育功能，即它能让人为之感染、为之奋起，并将精神上的震动转化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现实的行动。

通过艺术审美对人进行美的教育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那些由旧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文化观念、思维模式正逐渐被毁弃，另一方面，由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则有

①桑塔耶那：《美感》第 5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12 月版。

泛滥之趋势。与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时代转换相类似，有关价值、理想、幸福乃至人类终极关怀的命题又一次凸现于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因此，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切怀有社会良知的人士，有责任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及其重塑的问题。要对旧的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与文化背景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思，帮助人们确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影响乃至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时代的前进方向。

我们认为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和框范其价值取向，是世纪之交中国学术文化各个不同学科共同面临的新的课题，在这一进程中，艺术审美任重而道远，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正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造就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然而，个人主义的负面效应又铸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病”。从萨特的“他人是地狱”到德里克对人的理性人的价值的解构，典型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却出现了人的精神萎缩、道德迷误的怪异现象。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背离的情况，在正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已开始显现出来。拿我们国家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利益的驱动，人与人之间也因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存在着种种矛盾，而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则并未建立起来《中国青年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精神病时代”悄然逼近》[①]的文章，文章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在年满 20 岁的成年人口中忧郁症患者正以每年 11.3% 的速度在增加。近 20 年来呈迅速增长之势，全球约有 5000 万人患有此病。在分析其中原因时，文章援引上海市精神病卫生研究所所长顾牛范教授对 1300 万人口的上海市的逾 75 万的各类精神、心理障碍症患者的调查，

① 见 199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

认定他们大多是因为工作、学习、生活压力过大、长年超负荷运转，引发了各种精神疾患。世界精神病协会的专家认为，从疾病发展史来看，人类已经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进入到“精神病时代”。可见现代生活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人们急需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有益的精神的疗治。我们知道，艺术审美对人的意义不仅是正面的，而且是积极的，从终极价值看，艺术审美对于培养具有高度觉悟、精神世界极度丰富的新人有着别的意识形态难以达到的效应。

拿我们国家来说，具有现代特色的当代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建构，必须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要在一个超越了物质匮乏的社会中，培养起与之相匹配的精神上同样十分富足的新人——“自由自觉的人”，也就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美学层面上的生成。这是一种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富个性，发展全面、创造力极度发达的新人。马克思将人的这种生成水平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思想以人为思维中心的特点。

我们认为，人的美学生成的思想是从人的审美体验中获得并巩固起来的。人们在自己的审美体验中获得了那么美好的经验，他们在艺术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比现实更为合理的世界，因此愿意更深地沉浸于与现实存在着差异的美学意境之中；他们还看到艺术对人的精神的温情抚慰和积极调谐，看到人们经由审美实现了精神的升华和人格提升。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要设想人的发展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人的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他们在艺术中看到的那个世界变成现实存在的世界，而这样的实践从本质上讲，也就是艺术创造，当人们的实践活动开始自觉地向美学创造提升时，人的全部生活也会因此不断加强它的审美特性，而审美经验也就成了人的现实生活的经验。我们认为，这在目前虽然仅仅是设想，但现实的事态发展已经显示出美妙的前景：人类

会经过漫长的旅程，进入这个阶段，从而迈向自身发展的更高的层次。

人的美学生成的思想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的形成，在我看来，决不是没有思想前提的空穴来风。在中国,说远点,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们,虽然怀有克己复礼,用他们的纲常伦理原则规范人的行为，以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狭隘目的，但他们提出的有关人的行为规范中，却包含了提升人的精神和促进人格完善的内容。像‘ 推己及人 ’的泛爱的思想,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他人人格尊重的宽容精神。

降及明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出现了新的与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大相径庭的不和谐音。该时期先进者如李贽、戴震等人所发表的崇扬个性的言论，让那些固守传统的道德家们惊骇莫名。李贽他们以 “ 人欲 ” 来对抗天理，肯定了人的享乐与发展需要的合法性。与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极大关注相适应，李贽对在传统文化中被漫画化了的人的 “ 私心 ”,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 “: 夫私者,人之心者 ”,从而为 “ 私心 ” 找到了基于人性的坚实根基。他还公然张扬 “ 有私所以为君子 ’的人性自私论。明清之际思想家对‘ 人欲 ”,对‘ 私心 ’的肯定，其价值在于它为现代人格的建立，特别是为个性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空间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而这些古人的思想局限也是一目了然的。例如，他们所倡扬的精神素质主要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 人欲 ”“‘ 私心 ’正是稍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竭力推崇的东西。此外，由于他们的观点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拨出现的，因此，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情绪化的成分，亦即矫枉过正的偏颇。

近代中国，在深重的国难面前，人们在思考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时，人的精神与人格的重建，成了时时引起思想界情绪兴奋的话题。思想界的前辈们继承中国先贤关于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传

统的训诫,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关于现代人格建构的思想,针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蒙昧,奔走呼喊,开展了艰苦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的目的，被当代学者称之为企图在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社会中塑造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人格’,或曰重建人的‘现代性’。这一时期最早从事思想启蒙的思想家也是当时力主变革的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他们的代表。康梁等人对中国社会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在他们的论著中,对国民素质相当精细的解剖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据此，他们强调了对国民精神进行改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改造,建立起现代人格特性,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针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三纲五常’说教,康有为强调要建立以人人平等为核心的“人类公理”①。梁启超也对新的理想人格作出了自己的设计，认为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人格应当具有如下特征:自治、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进取、冒险、坚毅、尚武。他还改造了中国古代的泛爱的人生观,认为,在现代人格中,还应具有‘爱群、爱国和爱真理’的基本素质。在戊戌时期的先进分子的启蒙思想中，同样包含了许多杂质,第一,他们倾向于改良,而不是革命;第二,他们用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和方法,大多取自于传统文化。因此,理论的不彻底是该时期启蒙运动的一个通病。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最为彻底的时期。“五四”新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封建专制对于人们的思想的荼毒，因而对封建名教进行了更为深刻、更为彻底、更为系统的批判,并高高地举起了个性解放的旗帜。总起来看，该时期的思想启蒙表现出下列新的特点：

第一，张扬个性，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否定了传统思想文化否定个人价值的积弊;另一方面,又克服了西

① 《孟子微》。

方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个人价值而漠视社会整体利益的缺陷。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①。将个人觉醒看作是国家兴亡的标志。陈独秀分析了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特征——损害人格、抑制意志自由。他认为,要摆脱封建礼法对人性的戕害,就应有人的个性的大的觉醒,如他所说:“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足何言?”《敬告青年》② 则更明确地向青年们呼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陈要求青年们应有自主意识,“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五四”时期曾经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胡适也对个性解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自由独立的人格,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③。面对蒙昧,他向国人呼喊“救出自己”。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人在呼喊个性解放的时候,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张扬个性极为积极的陈独秀就明确否定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强调群己的协调——相维,认为要在国民中培养“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胡适则着力说明“小我”对“大我”(社会)的责任,肯定“自由选择之权”与社会责任的协调与统一。无疑,这同明清之际的李贽一意褒奖“自私”的观点和西方社会的利己原则相比,要全面得多、合理得多。

第二,强调个人奋斗,自强不息。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使中国人的性格中形成了极大的惰性力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随遇而安,且以安贫乐道和知足常乐来安抚正常的生活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感到绝望的人们。中国社会等级森严、文网高张,扼杀了中国人

①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载《新青年》1915 年 9 月创刊号。
③胡适:《易卜生主义》,载《新青年》1918 年 4 卷 6 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创造精神和进取意识。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浸透了苟全自保、自满自足的消极心理。“五四”新人清楚,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征是难以使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充满竞争充满挑战的现代社会，实现民族的振兴的。因此,他们竭力倡导奋斗、进取、创造的现代意识,希望以此来重塑国人的灵魂。“五四”新人相信世界是不断进化的,而进化是由不断的创造来实现的。因此,陈独秀将‘奋斗’提升到人性完成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奋斗乃人生之天职’。在上面提到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希望中国青年要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他说道:“生存竞争,势所不免”,因此,“一息尚存,即无守退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胡适也嘲笑那些只知抽身退缩的懦夫,他认为,世界需要人们去改造,个人的幸福也须自己去争取。苟且度日，则将一事无成。

第三,倡导科学,主张用科学精神来武装新的一代。在‘五四’新人看来，科学是疗治国人的迷信与蒙昧的一剂猛药。只有服膺于科学真理,人们才能摆脱偶像控制,摆脱昏聩、迷信的梦魇,获得做人的自觉。陈独秀明确提出要‘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① 对照西方人的科学的人生观，胡适痛感中国人的思想与科学之路相去甚远。他认为中国人懒惰、短视,对个人及家庭之外所发生的事,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浑然无知。因此,胡适着力于宣扬科学,企图用科学精神来塑造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型人格主体。

总起来看,“五四”前辈在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对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他们企图以自我意识、科学精神和创造奋进的意识来重塑国人的人格和灵魂，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思考和重建现代人格

①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第 3集第 1卷。

也依然有相当价值的启发意义。当我们启动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巨大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五四”前辈的思想遗产中得到的启发是相当丰厚的。

在新时期人的精神与人格的重建中，文学艺术绝不是无事可做的。

在当代找求人的精神升华之路的各种努力中，美学之路的价值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的理论前辈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艺术。康德在人生的重大矛盾之前，企图借助审美来沟通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间存在的矛盾。而席勒也在感受到现实的深深痛苦之后，意识到审美的拯救意义，他在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诗意与庸俗的二元对立中发现并阐发了艺术的升华作用。嗣后，像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等无不以美学作为寻求人的解放道路的门径。例如，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艺术审美活动对人的心理的积极影响。他指出“：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它所以特别重要，与其说因为能造就艺术家或艺术产品，不如说能造就更好的人。”①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蔡元培先生是将西方具有科学色彩的美育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大声呐喊，企图用美育来代替宗教，实现对人的灵魂的救赎和完成人的精神的提升。嗣后，美育成了每一个涉足国民精神改造的中国知识者看来有效因而也是难以忘情的思想工具。不少作家艺术家是怀着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涉人艺术创作领域，而探讨艺术的美育功能的论著也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有美育理论著作对美育的内容与意义的认识并不全面，不少论者将美育局限在审美观照和获得美感这样的纯粹精神生活层面，在对艺术作品提出美育要求时，也仅限

①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第 61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于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这一点。对艺术在对人的灵魂的重塑中的重要作用及艺术的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特性却缺乏认识。在我们看来，艺术既可以对人进行精神启蒙，又可以以自己美的存在指导人们的实践，促使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对世界进行新的重建，推动世界的审美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新的形势，又使包括美育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更具紧迫性。西方社会病态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物质财富惊人的积聚，并不必然地伴随有精神的升华。有鉴于此，我们应对艺术的美育能量作科学的开发，加强内含理想与情操因子的审美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同时也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美育研究，为审美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本书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为艺术所确定的终极目标和对人的美学生成的卓有成果的思考，集中探讨文艺与人的关系，探讨艺术审美对人的精神重建的意义及内部机制。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的锻炼与烛照，有自己确定的美学的历史视野，在这一特定的思维视野中，美育是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思想动力，以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为实践目的，情感愉悦、理性体验、能动改造三位一体的生命活动。马克思主义美育理论贯串了一条鲜明的人学线索，即以人类的解放、灵魂的重塑和社会的进步为其终极追求。在他们看来，人的美学生成是人自身发展的最辉煌的阶段，也是共产主义建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类发展前景的科学猜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揭示了人类进步的线索，即人不断从物种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将自己提升出来。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几位代表性的缔造者的美育论述无不体现出他们对人类命运、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因而显示了理论的彻底性品格。“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人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二为方向”之成为

马克思主义美育的重要命题，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美育的这一人学特性，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美育理论力图用积极的美学理想实现对整个世界的重铸，使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提升到美学的水平，将美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美学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人不可能在一夜间实现灵魂的净化，成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 一个完整的人 ”。人在自己的发展长途上经历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美学人的过渡，具体来说，经历了自然人、经济人、道德人、美学人的发展旅程，其中经济人、道德人、美学人属于社会人的范畴，是由其不同发展水平所确定的社会阶段。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艺术之所以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因为艺术审美是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艺术对人生持一种严肃的审视与批判的态度，它总是蕴含着巨大的超越升华的要求和力量，艺术以爱与美为价值取向的创造本性和情感特征，体现了对人生的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关怀，审美完成了对复杂的现实关系的超越，由此获得了和谐的心理感受，而和谐也是人的基本的和最高的追求，通过审美，通过艺术的熏陶，艺术和谐会转化为人类争取现实和谐的努力，融入人的实践活动中去，整个社会将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实现社会生活的审美化。

第一章　文学艺术与人学理想

在今天的理论界，讨论文学的人学特性最能获得共识，但20年前，这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争论的结果竟是对这个命题的否定。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清晰地折射出人世的沧桑。虽然如此，我们认为，对于文学的人学特性的认识需要深化，走出望文生义的低层次把握，对它的深刻蕴含作出科学的解释。从本书的论学宗旨看，这也是建构新的美育观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新解读

在解读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一切怀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的美学家的著作时，我们都会发现他们关于美学理论的论述包含了对人的命运的历史的思考和深情的关怀。他们的美学论述着力揭示了文学的人学特性，并对作家艺术家有相当多的期许。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学视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哺育，后者构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历史起点。我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惟一起点

是不全面的，它不符合马克思美学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也无法解释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什么在其总方向上总是保持着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一生奋斗的终极目的的一致。事实上，引发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作美学思考，并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精神实质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有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实状况的深入观察和哲理思考，以及由此而升发出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些要素一起构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现实起点和核心内容，并使马克思美学思想显示出鲜明的人学特性。

拿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美学思想来说吧，由对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的了解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紧迫感和受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的鼓舞而引发的对前途的信心，成为左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影响他们一生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主轴，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无疑受到他们的人学理想的烛照。无论是早期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手稿》,还是后来的《资本论》，其美学思想的全部阐述融贯了对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解放理想的执着追求，并因此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

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 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程来看，早期的他们，较多地注意于反映在生产关系上的两大阶级的政治上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所表达的美学见解中充满了政治上的愤懑和激烈的反叛精神便是不足为怪的。对资产阶级正义的控诉是马克思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0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